

黄侃——新训诂学的开路人

罗 邦 柱

王力先生四十年代提出要建立新训诂学。其实,新训诂学本世纪初就诞生了,它的创始人就是章太炎和黄侃二先生。特别是黄侃先生,作为章氏弟子,后出转精,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,把训诂学提高到一个新阶段。

王力先生认为,新训诂学应纳入语义学的范畴,成为语言学的分支,采用科学的方法,对词义发展作历史的研究。他说:“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,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。”^①“等到训诂脱离了经学而归入了史的领域之后,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。到了那时节,训诂学已不复带有古是今非的教训意味,而是纯粹观察、比较和解释的一种学问了。”^②

王力、黄侃两位语文学大师,尽管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甚一致,但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这一问题上,可以说是不谋而合,看法完全一致。新训诂学的建立就是一个明证。遍检黄侃先生小学论著,可以看出,他对传统语言学,既有继承,又有发展。在训诂学方面,他一扫前人囿于明经的风气,提出训诂必须在解释和运用语言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;必须改变单纯从文献上孤立研究语义的现象,转向从纵的方面研究语言,寻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;反对主观臆测,主张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。下面谈谈黄侃先生这方面的重大贡献。

一、提出训诂学的新任务、新方向

清以前的训诂学家,包括有重大成就的训诂学家,只把训诂当作明经的工具。例如清代朴学魁首顾炎武,他所以潜心于考文、知音,不过是为了明经。他说:“读九经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。”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对词的本义、引申义作了深入的研究,涉及到词义的发展问题,但仍然是为了治经,不超出以字说经,以经证字的原则。他说:“玉裁之为是书,盖将使学者循是以知假借转注,而于古经传无疑义。”^③王念孙、王引之同样摆脱不了经学的束缚,虽然创获很多,也不过是就古音以求古义,述经义之所闻罢了。开始把训诂学纳入语言学领域的是章太炎,他第一个把传统的小学称之为语言文字之学。但他除了写《文始》求汉字变易孳乳的来龙去脉外,还顾不上给训诂学提出更多具体的要求。是黄侃第一个大破经学的藩篱,给训诂学提出了新任务、新方向。他说:

小学者,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。文字兼形、音、义三者。训诂者,义之属,而依附音与形,以探究语言文字正当明确之解释,推求其正当明确之来源,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。

诂者,故也,即本来之谓,训者,顺也,即引申之谓。训诂者,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。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,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,虽属训诂之所有事,而非构成之原理。真正之训诂学,即以语言解释语言,初无时地之限域,且论其法式,明其义例,

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。④

从这两段话中，可以看出，他认为训诂学所要解决的问题，再不是单纯地为了明经，而是：

1. 以语言解释语言，包括历代书面语言和古俗语。他说：“训诂非但施之于古书，亦施之于今文，非但施于纸上，而且施于语言，”⑤又说：“小学之于群籍，由经史以致词曲，皆不能离之，而或以治小学仅为读周秦两汉之书，误矣！”⑥

基于这个观点，黄侃先生研究语言文字触及到这个领域中的各个方面。例如对《说文》的研究，除致力于正篆外，还注意俗字的研究。徐铉校《说文》后附二十八个字，认为是俗书，不合六书之体，黄侃先生一一分析，认为它们完全符合六书体例。他还研究近世新造字，认为它们亦“深合造字之理。”此外，黄侃先生还进行方俗语的研究，《蕲春语》就是研究的成果之一。

对《文选》的研究是黄侃先生根据“小学之于群籍，由经史以至词曲，皆不能离之”的原则而进行的重要实践。他运用训诂学的知识，解决这部由先秦到南北朝文学总集中词义解释的不少疑难问题。其中对《奏弹刘整》的评点最为出色。这篇文章保存了不少南北朝的口语，有些词语，李善、五臣以及后代选学家都无法确解，经他批注，都一一涣然冰释了。

黄侃先生还把训诂学运用到字书的编写上，指出：“语根之学，非重在远求皇古之前，乃为当世争取字书之用。”⑦“字书之编制诚有不可缓之势”⑧，因此，他深入探讨，“略陈纂集编摩之法”，在“蒐收材料”、“断限”、“编制”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编纂意见。⑨

2. 论其法式，明其义例，使训诂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有体系的新学科。黄侃先生指出：“求学之道，不外先求其法，次之以施诸事，而后始能收其效用。”⑩中国训诂学尽管起源很早，但历代训诂学家都只着重于具体的实践，没有人作过全面的理论的归纳。他们的理论观点，零星地分散在对词义的解释中，直到黄侃才第一个初步建立训诂理论体系。他说：“所谓学者，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。明其理而得其法，虽字不能遍识，义不能遍晓，亦得谓之学。不得其理与法，虽字书罗胸，亦不得名学，……盖专门之小学，持之若网在纲，挥之若臂使指。而浏览之学，则雾中之花，始终模糊耳。”⑪他的《训诂学讲词》就是他总结前人二千多年来训诂实践得出的规律性东西，在讲词中，他列了九个专题：训诂之意义，训诂之方式，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，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，义训与声训，说字之训诂与解经之训诂不同，《说文》之训诂必与形相贴切，以声韵求训诂之根源，求训诂之次序等。这九个互有联系题目，实际构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训诂学体系。训诂学发展到今天，新出的训诂学教科书尽管理论更加全面完整，体系更加系统严密，内容更加充实丰富，但基本点仍脱出不了黄侃先生提出的九条。

3. 求语言文字的系统与根源。如果说，旧训诂学与新训诂学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的话，求语言文字及其系统与根源就是新训诂学一侧的基本线条。训诂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词义的，而不把词义和词形（文字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，词义解释就很难达到准确的程度，并因此而不能准确地运用语言。再说，在旧训诂学中孕育出这一新任务又是顺理成章的，因为它保存了各个时代丰富的训诂资料，如果能坚持正确的观点，采用科学的方法，从纵的方面进行研究，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。可见由旧训诂学转入新训诂学，既有必要，又有可能。黄侃先生这个新见解不但为当时学者一致公认，他的老师太炎先生也充分肯定，并采纳而造《文始》。他本人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，收入《说文笺识四种》的《说文同文》和《字通》，就是他研究词义发展和字体变易的部分成果。关于他这方面的研究，下面还要论述。黄先生开创的道

路，后人继续前进。七十年代末，王力先生写了《同源字论》，编了《同源字典》，有很多看法和黄侃先生非常相似，请看下面两例：

(1)《说文同文》：喜同台、僖、熹、嬰、歆、音、囁、媽、怡。

《同源字典》：熙、僖、嬉、娛、嬰、喜、熹、禧同源。

(2)《说文同文》：豕同豕、彘、豨。

《同源字典》：豕、豕、彘、希、豨同源。

还要提到的是，黄侃先生对词义作纵的研究，是把语言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。不但不避后代所谓“俗字”，还努力去寻找它变化的源头。例如他认为《说文》骨部的“𩑦”字，后出作“𩑦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腿”字。“𩑦”字就是今天的“硬”字。爻部的“爻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抛”字。木部的“𣎵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𣎵”字，语转变作“𣎵”字。手部的“𣎵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抹”字，“𣎵”字就是今天的“惹”字，“𣎵”字就是今天的“筛”字。心部的“𣎵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怕”字，等等。这些说法不一定个个正确，因为词义的演变是复杂的，但他能用历史主义的观点，为训诂学开辟一条新路，则是非常宝贵的。

二、用科学的观点指导训诂学的研究

在训诂学研究领域里，必然要接触到语言文字的起源，语音和语义的关系，文字和语言的关系，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原因等等基本理论问题。正确回答这些问题，并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训诂实践，是新训诂学有别于旧训诂学的又一个重要标志。那时候黄先生虽然未能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，但由于坚持了革命的、进步的立场，加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，在回答上述问题时，黄侃先生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观点。

黄侃先生没有直接谈到语言是怎样产生的，但他谈到词类产生的次序。他认为纯粹表达感情的词，即感叹词和语气助词产生在前。阿、哀、唉、号等音声。“皆矢口而得，不烦思索”，“五音之起，皆以表情；推其起原，此种声音，大抵与笑叹呻吟歌呼之音不相远。此一切声韵自然之质也。”^⑩感叹词出现以后，人们逐渐领悟到“声韵自然之质”的功能，于是推而广之，用来赞赏事物就出现形容词，用来描写事物就出现名词。他说：“指事之字，当在最先。生民之初，官形感触，以发词言，感叹居前，由之以为形容物态之语。既得其实，乃图言语之便，为之立名。是故象形之字，必不得先于指事。”^⑪黄侃先生这段论述，既是指明六书的先后，也是在说明词类产生的先后，这是他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。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，科学界仍在探索中，黄侃先生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，但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。

关于音与义的关系，黄侃先生并不承认语言产生之初音与义有必然的联系，这从他关于“同音异语”、“同语异音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。他说：“物有同音而异语者，亦有同语而异音者。同音异语，如蚤与瑟，同语异音，如《尔雅》初、哉、首、基俱训始是也。”既然同一个语音形式可以表达几个毫不相干的事物，同一个事物，又可用不同语音形式来表达，语言产生之初用某音来表某义就不是必然的了。

但是当—一个民族经过约定俗成，采用某音表达某义以后，音和义的关系就不再是任意性的了。词义的引申和新词的产生都要受语音的约束。这一点，黄侃先生论述很多，他说：“名者所以召实，凡所命名，岂漫然以呼之者乎？其呼之必然有其故。学问有当然而无偶然。不知其故，遂谓本无其故，则大不可也。”^⑫又说：“语言不可以求根，只限于一部分之民族。自是而外，凡有语义，必有语根。言不空生，论不虚作，所谓名自正也。《左传》言名有五，是

则制名皆必有故。语言缘起，岂漫然无所由来。无由来即无此物也。”^⑮又说：“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‘物自名也，类自召也。’故万物得名，各有其故，虽由约定俗成，要非适然偶会。”^⑯

上面提到的黄侃先生从事词义发展变化的研究，就是利用声义的这种联系，结合字形进行分析的，其中又以音为根本。他按照师说把文字的发展分为变易和孳乳两大类，音义不变，形有变化的算作变易（黄焯先生称为变相。实际分析中，包括了音变字，如天变易为天、颠、顶、囟、题）。义有稍变而音、形随之而变须看作两个词的算孳乳。也就是他说的：“观念已同，界说亦同者，文字之变易也。观念既改，界说亦异者，文字之孳乳也。如是则变易性为蜕化，孳乳性为分裂也。”^⑰又说：“变易者声义全同而别作一字，孳乳者譬之生子，血脉相连，而子不可谓之父。”^⑱沿着变易和孳乳两条线索，把古今所有文字串连起来，就得出一个脉络清楚的整体。因此，黄侃先生说：“凡字必有所属，孤立之字，古今所无。”^⑲

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也是个理论问题。以前的学者多不甚明了。大致有两个极端，一是王力先生曾指出过的，认为文字直接表示概念，字义由字形直接反映。另一种与此相反，只把汉字看作单纯声音符号，没有表义作用，否定字义的社会约定性。黄侃先生对此均有自己的看法，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。首先他认识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，文字后语言而生。他说：“昔结绳之世，无字而有声与义。书契之兴，依声义而构字形，如日、月之字，未造时，已有日、月之语，……至造字时乃特制日、月二文以当之。”^⑳这说明，文字和语言不是一个东西，文字只能代表造字时语言中的某一个词，而语言中的这些词远在未造字之前，已有长期发展的历史。因此，字根不是语根，只能透过文字找语根。他指出：“凡会意、形声之字必以象形、指事为之根。而象形、指事字又必以未造字时之语为之根。故因会意、形声以求象形、指事之字，是求其本字也。因象形、指事字以推寻言语声音之根，是求其语根也。”^㉑他举例说：《尔雅·释诂》初训始，《说文》云：“初，裁衣之始也。”则“初”为“裁衣之始”的本字，寻“初”的语根，实为“且”，“且”训荐席，始荐之席居于最下，故有始义。从示为“祖”，训为“始庙”。声音上，“初”古读清母模韵，“且”古亦读清母模韵。分清字根和语根，是黄侃先生贤于他的老师的地方。黄焯先生说：“近时若太炎《文始》，只能以言文字，不可以说语言。”^㉒

其次，黄侃先生又认为，文字作为一种符号，有自身构造和变化的规律，光由字形来推测字义，往往是靠不住的。初文的形体一般能反映造字时词的本义，但其时也已出现了同体异字的现象。如“豆”既为木豆，而“登”中之“豆”又象乘石，“囧”为古“明”字，又以为“目”字。一个“8”形，既为“申”字，又为“糸”字“玄”字。这都不能望形知义。再看形声字，声符假借的现象也很普遍。禄训福，声旁“录”实为“鹿”，禴训福，声旁“廌”实为“赐”。可见拘牵字形是无法求训诂之确解的。宋代王安石的《字说》，撇开声音，专门以形说义，遭到苏东坡的讥讽。王氏说波为水皮，苏氏反讥道：“滑岂水骨乎？”黄侃先生说：“此因执形以求，故有是误。荆公但知文字训诂之合而为一而遗其声，若以声音通假之说补之，则疑难不烦而解矣！”稍后王圣美的右文说比王安石进步，没有把形声字看成会意字，强调了声符的作用，但仍然拘泥于文字的形体，不明声符假借的道理。黄侃先生同样指出这一错误倾向，他列举裸、踝、课、敷、髀、夥、裸、窠、裹、颞、课、螺、螺等13个字，说明它们虽然皆从果声，而义大多不同于果。惟“裹”从本声来。

那么，能不能反过来否定字义的社会约定性，只从声音的通转来考察词义呢？这点黄侃先生也是反对的。他在称赞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有不少精辟见解的同时，又指出王“好以意破字，如改‘坎、律，铨也’之坎为次，‘振，古也’之振为自，皆嫌专辄。”^㉓对俞樾的《群经平议》，也有类似批评，说他“随意破字之病较高邮王氏为多。”^㉔

研究小学最正确的方法是形音义三者紧密结合。黄侃先生就是坚持这样做的。过去,自许慎用三结合的方法研究正篆以后,历代学者都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,而是各有所偏。清代段玉裁以声音通文字,王念孙以声音通训诂,都未能真正做到形音义三者互求。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章太炎。黄侃先生在论述“近代小学所遵循的途径”时说:“段氏则以声音之道施之文字,而知假借引申与本字之分别。王氏则以声音贯串训诂,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一物。……若由声韵、训诂以求文字推演之迹,则自太炎始。……由音而义,由义而形,始则分而析之,终则综而合之,于是小学发明,已无余蕴,而其途径已广乎其为康庄矣!”^{②6}黄侃正是在章氏开辟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进最有成效的人。他治小学之法首要一条是“一事必剖解精密”,也就是要从形、音、义三方面去剖解。例如他以《说文》示字为例,先辨其字形为“示”,次观其说解为“从二,三垂,日月星”,所以说解为“天垂象,见吉凶,所以示人也。”知其字义,然后从语音上求知示、垂、出同源,这样做就是“形以明义,义由声出,比而合之,以求一贯,而剖解始精密矣!”^{②6}

三、重视故训 恪守师承

新训诂学是在旧训诂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旧训诂学除研究目的、对象、方法须要改造以外,它保存了历代丰富的训诂资料和行之有效的训诂方法。没有这个基础,新训诂学是建立不起来的。黄侃先生之所以能继太炎先生之后开创新训诂学,与他重视故训、重视师承、扎扎实实地继承分不开。他遵奉的原则是:“师古而不为所役,趋新而不畔其规。”^{②7}

黄侃先生特别重视前人的训诂专著,特别是汉唐以前的专著。他把《尔雅》、《小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等十本书列为治训诂的根柢书,其中又有宾、主之分。前六种为主,后四种为宾,这些书他都曾经反复篇读,几能记诵。特别是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,治之更勤,认为:“《尔雅》解释群经之义,无此则不能明一切训诂,《说文》解释文字之原,无此则不能得一切文字之由来。盖无《说文》则不能通文字之本,而《尔雅》失其依归,无《尔雅》则不能尽文字之变,而《说文》不能用。”^{②8}此外,黄侃先生还列了一些辅助书,主要是后人为训诂根柢书及经书、史书作注的解释书。这些解释书他同样“反复数十过,精博熟习,能举其篇页行数,十九无差忒者”^{②9}

黄侃先生还提出“诠释旧文不能离已有之训诂而臆造新解”,“对古训宜悉心体玩,不应轻易驳斥”,“训诂之道须谨守家法,亦应兼顾事实”等训诂原则,可见他非常重视前人的训诂材料,特别是汉唐的材料。太炎先生称誉他“说经独本汉唐传注、正义,读之数周,然不欲轻著书,以为敦古不暇,无劳自造。”“季刚所守,视惠氏弥笃焉;独取注疏,所谓犹愈于野者也。”^{③0}王力先生也提出过要重视故训的主张。他说:“训诂学的主要价值,正是在于把故训传授下来。汉儒去古未远,经生们所说的诂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,可信的程度较高。汉儒读先秦古籍,就时间的距离说,略等于我们读宋代的古文。我们现代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?还是千年后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?大家都会肯定是前者。”^{③1}可见两位语文学大师都遵奉着同一原则。

恪守师承对黄侃先生的学术发展也是个重要因素。开创新训诂学,实际是他追随太炎先生而继续作的努力。上面提到,第一个把小学纳入现代语言学范畴的是太炎先生。他继承清代三百年来语言文字学的总成就,著《文始》,“总集字学、音学之大成。”^{③2}黄侃先生在他门下侍读,执弟子之礼,一直敬谨求教。太炎先生说他“性虽倜傥,其为学一依师法,不敢失

尺寸。”^②时人也说他“惟太炎先生，则始终服膺无间。”^③他重视故训，也是太炎先生影响所至。太炎先生给弟子作国学讲演时指出：“古人训诂之书，自《尔雅》而下，《方言》，《说文》，《广雅》以及《毛传》，汉儒训诂，可谓完备。”他告诫弟子说：“诠释旧文，不宜离已有之训诂，而臆造新解。”黄侃先生就是这样奉行的。

黄侃先生尊重师道，还表现在拜刘师培为师一事上。刘是他同辈，只比他大两岁，但经学造诣很高，而小学和经学过去是分不开的，新训诂学也要有经学的基础。因此，黄侃先生就毅然赴刘氏门下执贽称弟子，虚心求问，得益良多。他说：“余于经学，得之刘先生者为多，”^④又在祭刘氏文中说：“夙好文字，经术诚疏，自值夫子，始辨津途。”刘氏之歿，黄侃先生深为痛惜，尝喟然叹曰：“清世经师如孔广森、戴望，皆年三十有五而歿，刘先生亦止三十五，所造尤为卓绝。此三君者，皆旷世奇才也。”

自然，重视故训，恪守师承，最终还是为了创新，这一点前面已详为论述，这里不再重及。

注释：

①② 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第一册327页。

③ 《寄戴东原先生书》。

④ 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179至181页。

⑤ 殷孟伦《黄侃先生汉语论著在古汉语研究上的贡献》。

⑥ 《训诂研究》第一辑86页。

⑦⑧⑨⑩⑪ 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60页、14页、10页、2页。

⑫ 《黄侃论学杂著》第95页。

⑬ 同上5页。

⑭⑮⑯⑰⑱ 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48页、59页、197页、24页、34页、46页。

⑲⑳ 《黄侃论学杂著》第93页、119页。

㉑㉒ 《训诂学要略》第148页。

㉓㉔ 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35页、8页。

㉕㉖㉗ 《训诂研究》第一辑第93页、88页、96页。

㉘ 《黄侃论学杂著》第1页。

㉙ 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第一册第343页。

㉚ 《与人论小学书》。

㉛㉜㉝ 《训诂研究》第一辑第93页、94页、21页。